

THE WORKER'S PUBLISHING HOUSE OF CHINA

雷达著

民族灵魂的重铸

中国工人出版社



民族灵魂的重铸

——雷达评论选



00468471

中国工人出版社

(京)新登字 145 号

民族灵魂的重铸

雷达 著

1992年7月 第1版

1992年7月 第1次印刷

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怀柔东晓印刷厂印刷

850×1168 1/32 印张 14 千字 350

印数：1~2100册 定价：6.40元

ISBN 7-5008-1152-7/I·275

序

伯 勇

正在乡下，接到雷达兄的来信，说有一家出版社要出他的评论选，事既突然，索之又急，要我一定给他的书写个短序。他还说，并非不能在京城找到别人写序，但他就要我这个僻居赣南小县的朋友来写。他对几年前我对他的评论的评论比较中意。我与雷达相识已近七载，时有通信，见面却只有一次，可谓千里神交。我愿从一个小说作者的眼光，来看看雷达及其评论。

雷达是雄健的。他的雄健犹如一棵挺拔的树，立足于厚实的大地——对当代中国、当代中国文学的历史进程的深刻了解与体察。他初期的文章，具体评论较多，虽有股锐气和朝气，但失之清浅。当他一旦将其评论放到时代、历史和文学的总格局中锻打，便逐渐充盈起大家气魄，他的评论质量稳步上升，心灵的雄浑之气转化为文论的雄健。他评论过大量作家作品，他的雄健中有平和。对老中青作家和曾经发生、正在发生、即将发生的文学现象，都能正视，更能理解，并张开了热忱的、宽容的怀抱。他一方面热情而有深度地评价新时期以来有价值有生命力的文学，同时对过去时

代一度尘封又具当代意义的作家作品给予尊重和再认识。我能感觉到，他每写一篇或长或短的文章，既有深思，又伴随着奔突的、炽热的、深沉的心灵情感的交响，犹如黄河水寻找缺口迸进。情气势的浑融一体，贯串在他的写作过程之中。

· 雷达的雄健自有其特色，尤其是对农村题材创作的评论，可说是血肉交融，元气淋漓，读起来十分过瘾。他曾经把新时期文学的主潮归结为“对民族灵魂的发现与重铸”，这是他的一家之言，可以见仁见智，我是很赞同的。可以说，中国现当代文学凡是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作品，都离不开这根思想线索。这在鲁迅时代就已发端，然而在当今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行进中，又具有了崭新的时代意义。所谓“发现”，并不是一味地搜寻陈旧、丑陋、落后，理应包含搜寻和表现困厄中我们民族的高度耐久力和延展力。当今时代特征和社会条件已发生重大历史性转变，“但寻求民族精神的强韧、温厚、博大潜力的意向却开始上升”，“从民族历史中汲引伟大贡献精神的需要却加强了”，“对当代人的精神似有某种间接的熏浸、陶冶、补充的意义”（雷达文章语）。所谓“重铸”，当然不是抽干我们民族的“原血”，插上一枝时髦的现代之花，而是在打通历史的前提下来进行。把民族灵魂的发现与重铸看作当今文学的基本精神，不但不会割断历史，而且与我们民族的历史，世界的大势，衔接起来了。

雄健既是雷达文章的精神内蕴，也是他的文风光采。虽然新时期崛起的评论家们各有各的风范，但雷达的与众不同也是明显的。他的文气酣烈。他属于情感情绪型的评论家，但又不缺少相当的理论深度。他走的是情气势融于一炉的路子，把激情放到理性的模子浇铸出酣烈之文。他说，到一定时候他要转到理论和哲学、美学的系统的研究上去。对此我有所保留。依他的气质、秉赋、性格，面对滔滔而来的文学潮流，雷达能坐得住吗？每个人的贡献是不必相同的，倘若他能不断写出掷地有声的评论，不也是一份可观的贡献吗？

我喜欢黑塞的几句诗,把它移赠雷达兄,作为祝福和共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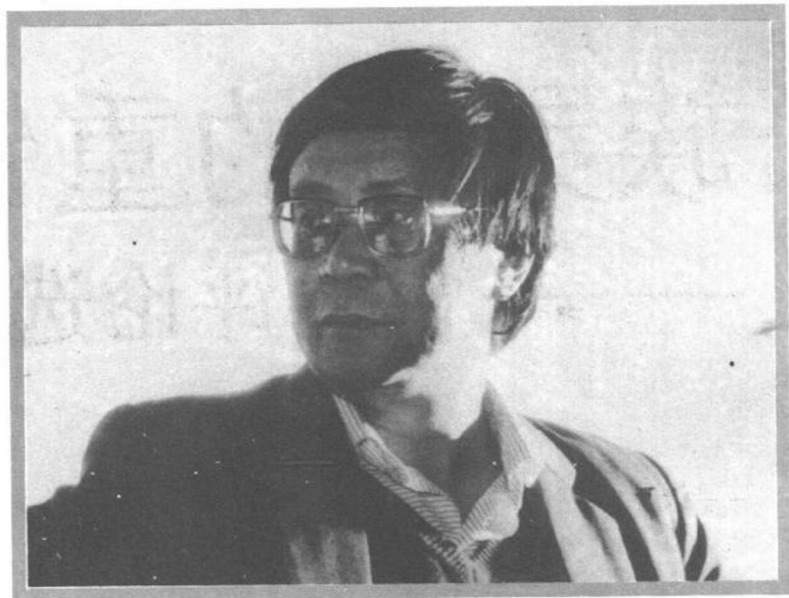
当我们的生命旅程稍稍安定,
舒适生活便使意志松懈,
唯有时刻准备启程的人,
才能摆脱懒惰的重负……

1991、5、17



责任编辑：李遇春 王一泉

封面设计：毛国宣



作者小传

雷达，1943年生，甘肃省天水县人。1965年毕业于兰州大学汉语言文学系。曾先后在全国文联，新华社，《文艺报》社做编辑，担任过《中国作家》杂志副主编，现为作家创作研究部副主任，副研究员。主要理论著作有文论集《小说艺术探胜》、《文学的青春》、《蜕变与新潮》、《灵性激活历史》等多部。曾获当代文学研究会科研奖，《上海文学》奖，《作家》奖，《昆仑》奖，《芙蓉》奖、《解放军文艺》奖等。

目 录

序 伯 勇

关于小说创作的若干思考 (1)

灵性激活历史 (15)

关于城市与文学的独白 (28)

主体意识的强化 (42)

报告文学的勃兴与嬗变 (51)

动荡的低谷 (68)

关于写生存状态的文学 (81)

一卷当代农村的社会风俗画

——略论《芙蓉镇》 (97)

历史的灵魂与灵魂的历史

——论红高粱系列小说的艺术独创性 (111)

论《古船》 (131)

《绿化树》主题随想曲 (151)

英雄雕像群

——《高山下的花环》人物赞 (168)

深度与容量

——读《被爱情遗忘的角落》所想到的 (174)

《鲁班的子孙》的沉思 (181)

说《厚土》

——兼谈意味、文体及其它 (192)

论《鬻毛》 (205)

《远村》的历史意识和审美价值 (217)

《白涡》的精神悲剧 (226)

我的心哟,在高原

——评《麦客》 (235)

敞开了青少年的心扉

——读《没有纽扣的红衬衫》 (241)

传统的创化

——从苗长水的小说谈一个理论问题 (250)

画出灵魂来

——读《小镇上的将军》 (263)

奋斗者的警钟与赞歌

——谈《飘逝的花头巾》的主题开掘 (266)

水的外形,火的性格

——关于《井》的联想 (272)

人的觉醒与反封建主题的推衍 (277)

从高加林到李治国

——兼论乡土小说的深化 (289)

论浩然的创作道路 (303)

模式与活力

——贾平凹之谜 (320)

高晓声小说的艺术特色	(335)
邓友梅的市井小说	(341)
注意力转移之后	
——关于何士光的创作变化及其“创作谈”	(350)
哦,乌热尔图,聪慧的文学猎人	(357)
沉有芷兮澧有兰	
——评何立伟的小说	(368)
民族灵魂的发现与重铸	
——新时期文学主潮论纲	(378)
诗与史的恢宏画卷	
——论《平凡的世界》	(401)
福临与乌云珠悲剧评价	
——《少年天子》沉思录	(410)
后 记	(439)

关于小说创作的若干思考

春节得暇，随手翻阅近年漏读的小说，不意渐渐读之入迷；一面深悔昔日对一些精采篇章失之怠慢，一面则对流行的“疲软”“停滞”之类大而化之的说法产生疑惑。诚然，如今小说已不复多年前的轰动爆炸之势，也不复几年前的思潮迭起之态，冷清了许多，但是，轰动爆炸需要足够的社会心理蓄势和历史条件的积聚，思潮迭起也是多重原因方可促成，它们都是可遇而不可强求的。因之，倘若不以轰动与否，热闹与否作为评衡创作发展的唯一尺度的话，那么可以说，即使近二年的小说，也依然没有止息它内在的一贯的探索精神。探索的热点可能有所移易，但探索的意向没有变；只是，难度更大了，步伐放慢了，纠缠的创作问题更复杂了，规模缩小了，一时难以形成声色壮阔的阵容。当我读到象《明天的太阳》《无边无际的早晨》《神戏》《狼毒花》《焚烧的春天》《毛雪》《半边营》、《女人秋》《小学老师》《乡村情感》等等作品（这只是一小部分）的时候，怎能不感到严肃的思考、惨淡的经营和鲜活的冲力。无论是乡土小说还是都市文学，都有一张希冀深化的犁铧在艰难地向下掘发着。

当然，不能靠这几部作品来概括创作的全貌，若把新时期小说比作一条河流，如今它的流速无疑是缓慢多了。但就某种意义来说，目前的状态也是一种必然，它有许多问题值得探讨，所以，重要的不是寻找词汇给它下个判断，而是要在顾及到小说创作整体流程的情况下，在深入到创作实践的动态中，思索问题。

这是不可能离开新时期小说的总背景的。新时期小说的繁复多样，常使概括者无从下手。近来忽然悟到，十三年来，无非是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先锋小说，新写实小说六大流脉的升沉浮降。所谓六大流脉，有些着眼于题材，有些着眼于思潮，有些着眼于方法，虽时有交叉，但眉目清晰，纵有例外，也不多，大体可以概括新时期小说的总体流程。倘换个角度，再看创作中的主题取向，也不是不可划分，大致有：政治主题、社会主题、人生主题、生命主题、文化或亚文化主题、非理性主题，历史主题等。这里所说的主题，是指关于价值取向的“大主题”，与具体作品的具象化主题自然有别。在上面列举的每种大主题的下面，都不难开列出一批相应的作品。比如，《伤痕》《重逢》属政治主题，《乔厂长上任记》《人到中年》属社会主题，《风景》《烦恼人生》属人生主题，《伏羲伏羲》《红高粱》属生命主题，《小鲍庄》《爸爸爸》《棋王》《厚土》属文化主题，《你别无选择》《黑颜色》属非理性主题，《国殇》《诺言》类属历史主题。观察这些主题的演化，交叉，变异也是很有意思的，从中也可理出一条新时期小说衍化的内在线索。

在这里，我们没有篇幅详细反思六大流脉浮沉的前因后果，也无法细致分析各个大主题的演化变迁，那是些大题目，留待日后去做。我之提到这些流脉和主题，无非作为一种背景，免得下面要谈的问题太突兀。下面还是扣紧近几年的创作来谈。在我看来，近几年小说的总势趋，是从“主观化”向“客观化”的过渡，从“观念潮”向“生活流”的过渡，从个体生命意识向群体生存本相的过渡。这样的概括当然不可能也不必囊括纷纭多样的创作

现象,但作为一定时期的主导性潮流,似乎也是无可怀疑的事实。我从当前创作中拎出了几个小题目,诸如:对主题意识的再认识,典型境遇和典型状态,自然主义复萌了吗,以及问题小说会不会复兴等。也许,这些问题正可窥见当前小说创作自我调节和演变的某些轨迹。

一、对主体意识的再认识

谁都承认,新时期小说比起过去时期的小说,无论内容、形态、方法、形式、语言均发生了重大变化,其缤纷多姿是空前的。那么,变化的原因和核心何在?毫无疑问,主要在作家主体身上,在主体的自如,主体的开放,主体的丰富和多样上。所以,尽管对主体性的认识还有分歧,或不无谬见,但主体意识的强化毕竟是值得肯定的进步。过去,我们确曾受到过机械唯物论和庸俗社会学的影响,恩格斯批评过的,旧唯物主义者总是从客体的形式理解事物,总是忘记“把它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来理解”的情形,在我们这里也多有表现,我们也确曾存在脱离主体的特殊性、能动性而片面强调生活的决定性的倾向。此如,不问不同作家的不同气质、个性、风格和感应范围、感应方式,一齐下去“体验”某一方面生活的现象;在艺术方法的选择,概括生活的方式,观察生活的视角上的一统化的现象,都曾经有过。新时期前期的伤痕和反思文学,它们的思想艺术成就自是不容否定的,其中生活的密度和体验深度也许为后来的某些作品所不及,但细想起来,它的方法、视角、表现方式倒确实比较单一,基本延续传统写实的道路。到了八十年代中期以后,情况发生很大变化,“外来的刺激”打破了原先相对单调的格局,好象在一个早晨忽然冒出许多种“意识”,如现代意识,忧患意识,忏悔意识,寻根意识,未来意识,宇宙意识,审父意识等等,多得难以计数。时髦所及,有些“意识”难免不科学,不准确,边界模糊,各执

一端，但都奔涌而出。与此同时，小说创作上的各种“化”也多得惊人，如哲理化；象征化，抽象化，心灵化，荒诞化，淡化，诗化，散文化等等。那个时候，小说领域确实是极写实的与极空灵的、极荒诞的与极理性的并存，各式各样的小说都出现了。在这旋转舞台后面的，则是作家们对生活的感受、理解、评价、把握上的多样选择。先锋往往是牺牲的代词，可资流传的精品或许不很多，但主体的活跃，创新的潮流，则对小说创作思维的开发，视角的变化，方法的选择，起到了开拓和冲创的作用，功不可没。小说的传统定义需要修改，人们开始看到小说表现生活的无限多样的可能性。

按说，小说创作因主体意识的初步强化就此可以节节推进，大幅度向纵深发展了吧？事实却是，前面的路并不径情直遂，繁华热闹没有维持太久，便暴露出一些新的问题。比如说，有些小说追求形而上的哲理，却没有足够的感性血肉；有些小说追求多义性的主题，反而变成无法卒读的理念集合；有的小说追求文化意识的显现，却因过分别除政治、经济、伦理、道德等较为切实的内容变得抽象而空玄。小说固属“无法之法”，伸缩余地极大，但对某些历久形成的可读性因素颠覆过甚，致使有些小说失却起码的传达功能。所以，“小说不好看了”的说法倘不是偏执传统，也不无一定道理。当然，不可否认，另一种情况也存在着，那就是摆不脱固定的视角，打不破积久的模式，永远在自己重复自己。这些不是一时间小说创作的全部，但也足以引起我们的注意和思考。过去，那种把小说作为形象地演绎流行政治命题的工具的情形，是一种非小说化，而近年来有的小说成为直接运载文化观念、哲学观念的形象化工具，也是一种新的非小说化。原因何在呢？我们以为，原因仍在作家主体身上。总的来说，主体意识的初步强化带来了艺术思维方式和表现方法的纷繁多样，但创作进一步发展的要求，特定时代对文学的要求，以及来自社会和读者的反馈，又把一个尖锐的新问题提到作家面前：怎样深入理解主体意

识的强化？什么是主题意识进一步强化，丰富化，深刻化的途径？这是关系到小说创作向深化和宏阔发展的关键所在。

在这个问题上，我以为存在着两种偏颇。一种情形是，误以为主体意识只是作家单方面的孤立的绝对的活动，把主体等同于“自我”的凭空发挥和张扬，出现了割弃客体面对个人的意志和本能的崇拜倾向，结果是“主体”吞噬客体，排斥客体，使其创作日益走向枯竭、重复、空玄和玩弄文字游戏。这不是什么主体意识的强化，而是跨出极限后的主体的泯灭。记得刘恒在一篇创作谈里说过，他是有憾于抽象观念对文学的强奸而转向生活化、生活流的。为什么看近几年的有些小说，我们常会产生观念、手法上去了，艺术、形象却跟不上去的感觉，好似一个头脑过大，躯体瘦弱的人呢？问题就在，观念不可能代替创作，主体意识在一个作家那里，决不是抽象观念的同义语。还有，对想象力，灵感，“陌生化”也有误解，看不到客体的制约力。我们的小说很长时期缺乏飞腾的想象，缺乏汪洋恣肆，天马行空的奇想，至于“陌生化”这一新型的艺术思维方式，就更隔膜了。新时期一些作家以奇诡的想象，簇新的感觉，让读者在惊讶和出神之迷中刷新对生活的感受，有力地打破了小说创作的闷局。有的作者借助梦境写出了好作品。但这并非柏拉图所谓的神灵附体，而是自有其情感记忆和情绪记忆的基础、头脑加工厂的复杂运作的。如果由此得出主观可以绝对和无限，可以完全脱离客体的结论，那就只能搞出些荒唐，杂乱，不知所云的东西。

另一种阻抑创作深化的情形是，作家的主体是对外来刺激和信息的被动接受器，他有个已经定型的认识图式和表现模式，不管现实生活如何变化，不管处理何种素材，他永远拿着那个模式来消化一切外来信息，于是，他的作品也永远是一种结构，一种色调，一种味道。这时常被誉具有稳定风格，其实主体意识酣睡，创作日渐陈旧。

这两种偏颇，即主体吞噬客体和客体压抑主体的现象，虽然

只是在一部分创作中表现出来，但它已成为小说创作向纵深发展的障碍。究竟应该怎样更完整、更深入地理解主体意识问题呢？主体与客体之分，其实是人类走出蒙昧状态后的一种觉悟，但在实际上，主体是须臾也离不开客体的。作家的主体能力任何时候都是一种对象化的创作活动，是主体客体化和客体主体化的对流过程。主体是主导的方面，它可以创造、建构客体，但同时客体对主体则有制约的一面。马克思说：“主体的物化，也就是实在的自由”。不管多么超逸、奇诡的主体，也不能不借助感性的形式、情感的符号来重现自身，超越自身。所以，主体进入客体的深度决定着主体自身的深度。一个不肯开放，不肯借鉴，不肯吸收的主体，必然是日渐衰竭的主体。主体意识强化的过程，也就必然是个双向寻找的过程，即寻找自我和发现世界的过程。它们不能割裂，只能在紧紧相依，时时撞击中进行。一旦割裂了，偏畸了，创作就会出现失重和失衡。当然，不同时期倚重点不同，倒也是自然的事。

上面，由于论题本身对科学性，严密性的要求，弄得我不得不做些枯燥的推理，但问题是绕不过去的，意思也是明显的，即作家和创作都需要不断调整。如果说，小说创作一度偏重于发现自我（这是很必要的），相对疏离了对象化世界的话，那么接下来发生在小说创作中的情形也就是必然的。为什么近三年来小说总体上趋向于平实化和生活流呢？为什么原先刻意追求文化意味和哲理意味的作家，转而隐蔽过于外露的自我，更加尊重描写对象，甚至一任生活的自然流泻，而很少表露明确的价值判断呢？为什么很多作品是以原生形态和“困惑”的面目出现呢？这里是不难发现作家对其主体意识进行调节的努力的。那就是试图通过扩大真实的领域和直面生存状态来推动主体的深化。如果原来是侧重主观的观念化革新，那么现在是侧重客观的生活化的征服。船，总是在一左一右摇橹中前进的。